

Globethics Repository



大國學視野中的漢語聖經文學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ong, Lia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14 18:24:4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22

《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序二

The Second Preface to *Sino-Christian Academic Biblical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Great Guoxue*

Liang Gong

阅读黄保罗先生的新撰书稿《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颇觉欣慰，感到这是一部在中国圣经学术史上将会留下一笔的著述。30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也许转瞬即逝，但对于当代中国的圣经学术发展史而言，却能分割出某些阶段，显示出各阶段的嬗变特征。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冰心、郭沫若等对圣经均有精当之论，其中周作人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堪称范例。嗣后30年汉语圣经研究愈益深入，涌现出吴耀宗的论文《略述希伯来思潮和基督教文学》、^①朱维之的专著《基督教与文学》、^②冯雪冰等的译著《圣经之文学研究》^③等。这波涌动于中国大陆的学术浪潮止息于

① 吴耀宗：《略述希伯来思潮和基督教文学》，载傅东华、郑振铎等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第14-22页。

②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

③ [美]摩尔登(Richard G.Moulton)著，贾立言、冯雪冰、朱德周译：《圣经之文学研究》，上海：广学会，1936。

1951年,那年朱维之在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文艺宗教论集》,收入他的《圣咏文学鉴赏》、《雅歌与九歌》、《景教碑文章句》等论文凡22篇。继而是左倾政治造成的大约30年学术寒冬。又一次时局改观发生于1980年春,那时朱维之在《外国文学研究》当年第2期上发表长文《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启动破冰迎春的航船。时至当今又一个30年过去了,此间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取得骄人的成绩,论文论著不断涌现,所论课题日益丰富,其学术品质也日渐提高,收获了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①刘意青的《圣经的文学阐释》^②等专著,以及刘衡先、王忠欣主编的“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③等译著。黄保罗的《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以其高远的立意、宏阔的视界和厚重的意蕴成为当代中国圣经学术园地的又一赫然成果。

本书的论述对象固然是“圣经学”,关乎一部众说纷纭的域外古代典籍,它的立足点却在中国本土,是一种“真正的大国学”。这种视野既区别于章太炎、钱穆等人主张的“国学”(泛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门类尤其“儒学”),也有别于季羨林所谓的集中国56个民族文化精华于一身的“大国学”,而是一种愿意与他者对话、代表中国形象的“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体,一种“充分体现和真实反映全中国精神体系的学问”,对内能“为全国国民提供明确的身份认同,使大家充满自信地明白‘我’是谁而积极地生

①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②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 刘衡先、王忠欣主编:“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包括[英]F.F.布鲁斯(F.F. Bruce)著,刘平、刘古友译:《圣经正典》;[美]T.D.亚历山大(T.D. Alexander)著,刘平、周永译:《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第二版);[美]布鲁斯M.麦慈格(Bruce M. Metzger)著,刘平、曹静译:《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美]J.格雷山姆·梅琴(J. Gresham Machen)著,杨华明译,孙毅校:《新约文献与历史导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活”，对外则能“成为中国的名片，使世界各地的他者都喜闻乐见地愿意积极与中国进行友好往来”。在这样的学问系统中观照圣经，显然能避免或者把它当成完备圣典而盲目追捧，或者将其贬为宗教垃圾而一味唾弃，相反，能够视之为古希伯来民族的文化遗产，兼具宗教经典、历史叙述和文学作品等多重性质，擅长从中汲取精华，服务于中国当下的新文化建设；在国家改革开放大业有待于从更深层面全力推动之际，富于智慧地从西方社会“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基督教文化中开掘出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如此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圣经研究，彰显出了一个爱国学者何等恺切的民族情和强国梦！

黄保罗新著所论述的是“汉语学术圣经学”，其间的核心术语是“圣经”，圣经的独特之处决定了这门学问的独到特征。提起圣经，人们会众口一辞地认同，它是世界图书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著作；它对世界文化的成长发生了一言难尽的重大影响——它迄今被世界最大宗教基督教的十几亿信徒奉为精神食粮，它的希伯来圣经（或谓《旧约》）是犹太民族的立族之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这些都是其显见的外在特征，而圣经的潜在特质，乃在于它兼为神圣文本和世俗文本的二元性。

作为神圣文本，它被犹太人和基督徒信奉为“上帝圣言”的载体，由此导致“信仰的诠释”，即从信仰出发，出于印证和护卫信仰的目的对圣经展开研究，做出论述。信仰是一种有别于理智和怀疑的特殊体验，是在无充分理智保证其命题为真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认同而拒绝怀疑的心理状态。既然以信仰为中心，就要求当信仰与理性发生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抑制理性，克服怀疑，而无条件地顺从信仰。耶稣登山训众时告诫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5：18）此言隐约透露出公元1世纪犹太拉比和基督教创始人对圣经的敬虔理解：圣经并非物质性的人工制品，它最初甚至非

由人力写成;其本体乃是上帝圣言,亦即上帝本身,早在创世之前就已存在。人们看到的那些有形字母不过是“圣经的外衣”,但即便那个外衣,上面的“一点一画”也都带有永恒性,“不能废去”而“都要成全”。不难推论,那个原初的圣经本体更是无穷无尽且无限神秘的。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圣经,才能进入一种向着无法言喻的终极神圣不断趋近的过程,那一过程永无终期,其间得以趋近而非背离神圣的前提是充足的信仰。

然而与此同时,圣经又是一部世俗文本,是与荷马史诗、但丁诗歌、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小说等凡俗经典有着充分可比性的普通书籍,也是由特定的世间作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受特定民族文化条件的制约、按照特定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写作并编纂成的作品,对它完全可以运用与其他世俗典籍相同的方式进行解读。这导致一类“怀疑的诠释”,所谓“怀疑”,是指以理智质疑任何超出直接感觉经验的知识,在圣经研究中,其矛头所向其实是非理性的信仰及其具体表现(比如诸般神迹奇事)。当然,对信仰的质疑常常施以较为圆融的策略,即尽可能回避或悬置信仰话题,而仅仅以理性原则为指针,对其他相关议题加以探讨。

从理论上说,“信仰的诠释”和“怀疑的诠释”似乎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就实践考察,二者的关系却有着种种相互重叠、交相浑融以致此消彼长的情况。在基督教最初1700年间,居主导地位的圣经研究一直是“信仰的诠释”。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降,在理性和科学精神孕育下,“怀疑的诠释”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这两类阐释固然“各领风骚数百年”,却又始终彼此兼容而共存于一个整体之中,迄于今日。对这种复杂的诠释活动,黄保罗着眼于诠释者身份(信仰或非信仰)及其进入圣经的路径(信仰或理性),梳理出四个层次的神学:一、局内人非理性信仰实践;二、局外人非理性实践;三、局内人理性教会神学;四、局外人理性神学。认为其中第三层(教会所属神学院校的理性教会神学)和第四层(大

学及研究界的理性学术神学)共同构成一种“学术神学”,它以“学术性”或“理性”为尺度,具有无可争议的科学性质。

强调一种区别于“信仰神学”的“学术神学”,无疑有益于澄清某些迄今依然令人困惑甚至使人心神不宁的认识:神学研究游离于科学研究,其实是在直接间接地为基督教信仰张目,乃至有意无意地为基督教的文化传教活动扬威助阵摇旗呐喊。这种模糊认识来自两个事实:其一,“神学”一词固然源于希腊文,泛指有关神的道理或学问,它在后世直到当代的广泛传播却得益于基督教的借用和引申,特指对上帝、基督及其与世人关系的研究;其间衍生出一个以“教义神学”为总揽,涵盖系统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道德神学和多种专题神学在内的庞大的信仰知识体系,其目的皆在于为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做论证。其二,中国内地现行的学科体系设置中未见“神学”一名(从理论上分析,神学教学研究也许被体制性地“划拨”给了隶属于宗教系统的神学院校)。在政府管理的大学中,与神学相关的教研内容被潜在地拆分到了文史哲的不同学科,如圣经—基督教文学分给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圣经—基督教历史分给了世界历史,圣经—基督教神学分给了世界哲学和宗教学。这种学科体制业已造成一种现象:如果在相邻学科“挂羊头卖狗肉”地进行实质上的神学研究,是“名正言顺”的;但若开诚布公地打出神学研究的旗帜,则显得“名不正言不顺”,立场含混,方向迷失,形迹可疑,难免遭到质疑甚至诟病。所以,在“学术神学”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学术圣经学”,对于推动中国内地当前和今后诉诸于汉语的圣经学术研究,肯定具有正本清源、回归本体的理论意义。

圣经是古犹太—基督教文化的百科全书,富含宗教、神学、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文学、艺术及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就其各科知识无不借助于语言进入文本、形成书籍,其后才能传诸于世而言,所有学科都是

“毛”，唯独文学才是“皮”，因为文学所瞩目的乃是各种知识赖以依存的文本，具体说来，是特定知识凭借语言有效地表达出来，成为能够为人理解和接受的文化成果的实现方式和手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在当代中国，研究圣经—基督教神学的人居多，关注其文学者却相对稀少。可喜的是，黄保罗这部新著为圣经文学研究分配了相当可观的篇幅，议及几乎所有应论的课题，诸如作为文学作品的圣经、圣经在传统文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学性、圣经文学的修辞特色、圣经文学的新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以及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圣经与文学，等等。该部著作运用中国桐城派兼顾“义理、考据、辞章”的诠释学理论建构其论述框架，确认对圣经辞章的研究实即着眼于文学视角的圣经研究，这种借鉴中国传统经学理论的尝试令人称道，也得到能使读者眼前一亮的学术效果。

作为一部全景式的导论，本书议及汉语学术圣经学的各个角落，能使人一书在手即可进行上下两千年、纵横八万里的恢弘鸟瞰。相信从初学者到专业人士都能从中受到启迪，各得其需。

梁 工

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副会长

2010年6月30日于古都开封